

学林

的内情。现摘录如下：

玉言兄如握：
前奉手札，未遑即复。《脂砚》一文已由弟将其中最重要之第二节揭载《文汇报》磁力版，并已致函《燕京学报》洽商，谅无问题。该文稿后江南读者大为震惊，皆以此为惊人发现，被剪《亦报》一短文奉览。读者更多投函询及《证石记》一篇，请《文汇报》商见连载者，可见受人重视之一斑也。弟连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及此书出版事，尚无结果。苟能得吾兄原稿一谈，当更易于着手也。《文汇报》近连续刊载论红长文，大有红学复兴之势，亦一胜事。俞平伯曾写两文，然渠未见燕大所藏脂评，所见不广，只论刊刊字尚尚细密耳。颇拟愿兄将《证石记》中最精彩之篇章衍为小文，如大函所言，于弟所编之副刊上零碎发表之，当可获得江南读者之重视。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皆极熟悉之朋友，弟可致函介绍，公家如不能出版，开明书店当可出此书也。……勿此，即祝刻安！
弟鼎昌顿首
庚寅中秋前夕

曲，谨以奉闻，乞谅至幸。一俟何时取回，即当携去。请勿念。专上，并候祺祺！不庄。
生 汝昌再顿首
庚寅中秋前夕

此信落款为“庚寅中秋前夕”，与上一信相隔整整一年。其间当有其他往来书信，目前尚未发现。

由于父亲在1947年12月发表了“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后与胡适先生有了交往，父亲从胡先生那里获益匪浅，又得他指示途径，这样父亲的“红学”基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较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父亲由此走上了治红之路，其《红楼梦新证》（初名《证石记》）亦已经开始创稿。

1949年，父亲在读大四，他早早定下毕业论文题目：“An Introduction to Lu Chi's Wen Fu (陆机《文赋》的英译)”，因为论文需要早点妥当安排，所以父亲忙里“偷闲”，一刻时间也不能浪费，努力研《文赋》不辍。

9月，父亲撰写完“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至12月，此文得以在哈佛燕京学社的《燕京学报》37期发表。父亲在文章的最后透露：自己将有一部《证石记》（即《红楼梦新证》）之愿。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不小的反响。老同窗黄裳，时任上海《文汇报》编辑，很快就把这篇文章的第二节“脂砚斋是史湘云”发表在《文汇报》磁力版，于是大江以南无不以为石破天惊之论，纷纷报函与《文汇报》问长问短，甚盼得见《证石记》的详情。

陈梦家注意到父亲的这篇文章（《燕京学报》37期父亲文章的后，便是陈梦家的“六国纪年表考订下篇”），向父亲索稿，就是《证石记》书稿。陈梦家和赵紫宸向父亲借阅抄录的胡适《甲戌本》，也应是在这一时期。

另外，可参阅1950年9月7日黄裳写给父亲的信，似可作为对致陈梦家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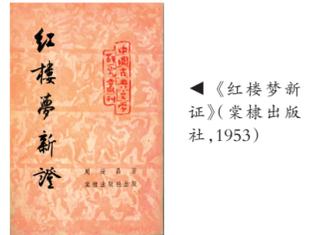
最见的一封，时间为1950年12月24日之后。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陈梦家使用的信封乃他人写给赵紫宸的，封背邮戳所示时间如此。函虽寥寥数语，却与父亲致陈梦家第二信紧密关联。

汝昌同学：
奉还尊稿，请检收。此次所见较前更为整齐，甚盼能出版也。天津某君用毕后，仍请见假。勿此，即请学安！
陈梦家拜

《燕京学报》第37期刊发父亲“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后，文杯沙很快谈到了。他于1950年10月10日写来一封信，说因此文欲见父亲，特为冒暑去燕京一次，可惜未能见到，并在信末附上地址。父亲的《证石记》于1950年已经基本成稿。陈梦家还回的书籍，正是《证石记》。

1951年11月父亲被四川成都华西大学聘为文学院外文系专任讲师。1952年4月，入华西大学任教。1953年9月，《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印行问世。

父亲与陈梦家师生之间肯定还有不少书信往来，衷心期盼有新的发现，新的消息传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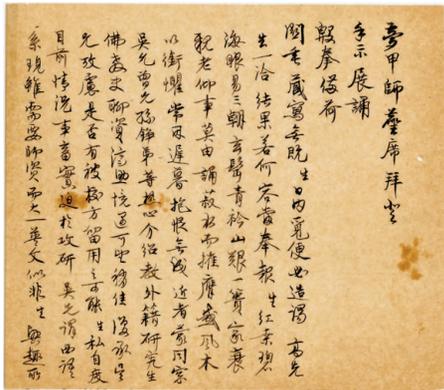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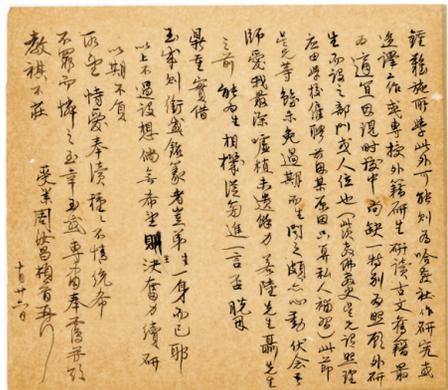


“伏念吾师爱我最深”

——父亲周汝昌和他的老师陈梦家

■ 周伦玲

1949年，父亲正读大四，面临毕业。家境的艰难，学业的前途，都在父亲考虑之中，也正在寻找解决途径，探寻下一步出路。父亲向老师陈梦家讲述自己的身世处境，也讲述如何由热心同窗介绍得到教外籍研究生佛教史职位。



▲ 1949年，周汝昌致陈梦家信 方继孝提供

愁来乘隙，梦起续全形。独坐谁相伴，斜阳竹一茎。

此时的燕大，早已名师散尽。当年与父亲一起读书的同学大平均已毕业，有的已成为老师，于事业方面亦各有安身立命之所，而父亲却还是名学生，于心耿耿。父亲说那时他所听的课，实在打动他的心灵，他在给老师随信先生的信里诉说：所学西文学格甚阔，“教者言之质且浅”，自然父亲要另寻自己的“境界”。那时，父亲虽身在西语系，课余时间必到图书馆去看书，看洋书，也看古籍，而且已作起“考证”文章来了。就在此时，也就是1947年10月，刚从美国返国的陈梦家在燕大开了门文字学课，父亲前去听课，感觉很不错，即选修了这门课程。这样，父亲成为陈梦家的学生，他们由此熟悉起来。

我们先来看看此次澄心堂梦甲室存札展中父亲致陈梦家的信，内容如下：

梦甲师座席：
拜呈手示，展诵殷拳，备荷关垂，感写无既。生日内便便造谒高先生一治，结果若何，容当奉报。生红桑碧海，眼易三期；玄鬓青衫，山艰一餐。衰衰亲老，仰事莫由。浦菽水而推，感风木以街。常因迟暮，抱恨无成。近者蒙同窗吴允曾兄、孙铮弟等热心介绍，教外籍研究生佛教史，聊资济助，境遇可望稍佳。复私思考者是否有被校方留用之可能，生私自度目前情况，事畜实地于攻研，吴兄谓西语系现虽需要师资，而大一英文似非生兴趣所钟，难施所学。此外可能则为哈燕社作研究或译译工作，或专授外籍研究生研读古文献最为适宜，因现时校中尚缺一特别为照顾外研而设之部门或人位也（此次教佛教史，吴兄谓理应由学校雇佣，兹因某原因只算私人补习），此节吴兄等虽未免过问，而生闻之颇亦心动。伏念吾师爱我最深，嗷植未遣余力，若陆先生、聂先生之前，能为生相机从旁进一步言否？脱因鼎重，实借玉成，则感铭篆者岂弟生一身而已耶？以上不过设想，倘无希望，则生决奋力续研，以期不负所望。恃爱拳深，种种不情，统希不罪而怜之，至幸至感。专肃奉覆，并颂教祺！不庄。
受业周汝昌顿首再拜
十月廿六日

想，倘无希望，则生决奋力续研，以期不负所望。恃爱拳深，种种不情，统希不罪而怜之，至幸至感。专肃奉覆，并颂教祺！不庄。

父亲自1940年入燕大文学院，即以成绩优良，家境清苦，获赠助学金。至1947年父亲再入燕园时，已历经八年丧乱，老父古稀，家境确属清寒，父亲再向梅贻安院长递送申请助学金书，梅院长在申请书上批道：“素不相识，但文字绝佳人才也。”再次批准了助学金。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父亲为何向陈梦家讲述自己的身世处境，又为何讲述由热心同窗介绍得到教外籍研究生佛教史职位的缘故。此信未落笔前，但可以判断是写于1949年。那时父亲正读大四，面临毕业。家境的艰难，学业的前途，都在父亲考虑之中，也正在寻找解决途径，探寻下一步出路。

彼时父亲教外籍研究生佛教史，这个美国留学生即 Arthur Link (林阿释)。林阿释研究的主题是中國佛教史，具体工作是要译《高僧传》。而这项研究的必修是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史》。汤著用的是文言，文体考究，词典典重深奥，又是佛家事情，全是专门术语。林阿释当然是“啃”不动的，就托人找到父亲。林阿释后来很有成就，也很有名望，他非常感动，写信给父亲说：“自你从我这儿以后，改变了我对前程的展望计划。”这份外教工作，既解决了外国研究生的需求，也改善了父亲的境遇。

父亲后来还作过西语系外籍教授包贵思(Miss Grace Boynton)的课堂及改卷的助教，这些工作不仅使父亲受益匪浅，且缓解了父亲生活上的窘况。父亲当时对留校教大一英语不感兴趣，希冀“为哈燕社作研究或译译工作，或专授外籍研究生研读古文献”。父亲希望老师能在陆先生、聂先生之前

为自己从旁进一言。“伏念吾师爱我最深，嗷植未遣余力”，看得出，陈梦家对父亲关怀有加，父亲则感激不尽，二人绝非一般师生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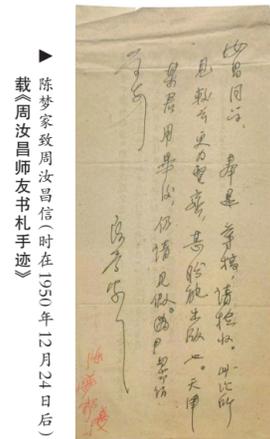
父亲与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也有交往，也曾为其做过助教。有一次包贵思邀请父亲去她家晚餐，见面之后，即取出paper(卷子)给父亲；上面用铅笔写了几行字：“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师的一鞠躬！”(What this paper should gain is not a grade, but a bow from the teachers!)当父亲拿回来再翻看各页时，发现这卷子已由赵萝蕤女士看过。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当时是燕大神学院院长，父亲拜会过赵紫宸。赵紫宸曾送父亲一册自己的《雨工牧子诗译》，他在扉页上题记作“汝昌先生存 三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陈梦家是有名的诗人，父亲自幼也喜爱韵语，且写过很多诗作，有很多诗集，如《细雨簷花馆词》《燕园集》《胜利集》《沧浪集》等等。父亲能与陈梦家和赵紫宸交流诗作，正是他们诗人的气质、教养与精神的相通之故。

父亲在信的末尾说：“以上不过设想，倘无希望，则生决奋力续研，以期不负所望。”1950年1月，父亲报名燕大中文系研究所，2月，父亲已经拿到了燕大中文系研究院的入学证。

再来看第二封信：

梦甲师：
承索拙稿，本可以立即奉去，奈该物前此已为一至友持去，为日已多。生亦正思藉此取回，因去函说明原由，请其送还。乃今日得覆，谓该物已转入第三人(亦系至友)，该君与出版家稍有瓜葛，意欲印行，正在审查中，一时不能交回去。此事并未预兆，生之意见口吾师知。私意该物口随未必有人皆印行，不过一谈而已。然一时竟不能索回，师多嘱(询)及此，仍不能送上，实深罪疚，恐未明委



▲ 陈梦家致周汝昌信时在1950年12月27日后(载《周汝昌师友书札手迹》)

百年前的江南校园体育往事

■ 王启元

民国时期，南方的大学之间经常有足球比赛，而在上海本地，外侨们也经常组织锦标赛，这些客观条件无疑让当时的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足球城市。当时有一支颇为励志的大学队，一直活跃在南方大学联赛中，这就是民国复旦足球队。早在《复旦杂志第一卷》(1985)中就提及，复旦久有体育运动的传统，早期历任校长马相伯、李登辉都注重体育教育。而复旦足球队运动大抵是在吴淞时期就已开展，而徐家汇李公祠时期的学生、日后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1897—1969)就回忆过自己在饭堂前踢球经历。复旦足球队是后起之秀，沪上另有两支老牌劲旅：圣约翰大学(已停办，今址为华东政法长宁区)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这些老对手间的比拼便是民国大学之间重要的校际互动，也构成了当时灿烂的校园与体育文化的风景线。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早年复旦足球队实力弱，与南洋踢是屡战屡败。据说一位南洋的杨同学每次赢复旦就会写一章章回小说，称复旦足球“不见经传”，南洋战复旦犹如“弹琵琶”，“胜得‘写写意意’云云。二十世纪初，圣约翰绝对是沪上第一的球队，南洋通过多年的努力在1908年第一次战胜对手。彼时远在吴淞的复旦似乎还没有进入当时的高校足球圈，直到搬到西市的徐家汇李公祠后，因交通便利往来开始多了起来。圣约翰与南洋间的比赛不仅这两校参与，当时华东地区大学已有自己的体育联盟：“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简称为“江大”。联盟之中的体育项目也不限于足球，篮球排球与田径都是常设项目。“江大”最早源于1904年4月23日成立的“中华大学联合会”(China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Assn.)，其由徐家

“超巨”李惠堂

民国时期中国足球最著名的超级明星无疑是李惠堂，而李惠堂在职业生涯黄金时期还一度兼任复旦足球队教练，彻底提升了复旦足球的实力与影响力。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号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粤籍客家人，生于香港，中国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被后人誉为“中国球王”。17岁，李惠堂便加入香港的南华足球队，从乙组乙队(预备队)一直打到主力在边锋位置。一年后，香港南华代表中国参加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18岁的李惠

堂以主力身份蝉联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冠军，其间回国更是以5:1战胜东道主日本。下半年李惠堂随南华队赴澳洲踢球一年，次年离开南华，来上海发展，加盟沪上乐群俱乐部，后改名乐华，参加沪上的外侨及华东地区的表演赛。来到上海的李惠堂大部分公开资料记载李惠堂1926年被复旦聘请为足球教练，甚至说任“体育系主任”。其实他既不是1926年才来复旦，也不是所谓“体育系主任”。南华队澳洲之行结束后的1925年，李惠堂便来沪加盟上海乐群队，并很快与复旦取得联系。1925年12月4日《申报》有一则《乐群与复旦明日比赛足球》报道载，复旦足球队当时已非常强劲，但由于前述的“八大学运动会”自身出现问题，是年不得已退赛。但“与中西各强队比赛，每战必胜，从未失败一次”。甚至，复旦队刚战胜代表日本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的关西足球队，又赢了一个5:0。之后报道第一次提到复旦聘任李惠堂的消息：“该队近聘远东足球队明星李惠堂君，为名誉教练，指导一切，成绩益见优良。”5日下午，李惠堂就要跟李惠堂的老东家在“中华棒球场”来一场友谊赛。如此则李惠堂1925年底前，便已加盟复旦足球队，并率队打过比赛，时年年仅20岁。

同时，此时复旦没有专门的院系系教授体育专业，只有一个管理校园体育课程、比赛的“体育部”，分设主任、助教。有记载看到李惠堂确实任过“体育部”；1926年9月10日《申报》有一篇通讯《本屆复旦大学体育部之组织》里提到复旦“体育主任李惠堂君因欲恢复其业余运动员资格”，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

赛而“特辞去主任一职”。主任的任务是带领复旦足球队在内的各大体育项目团体训练、比赛。这位教练兼领队当时不过20.21岁，是一位本科上运动员的同龄人，可以视作复旦体育史上的活话。

顺便提下李惠堂的母校乐华队经常比赛的那个体育场“中华棒球场”，与今天的复旦也有些渊源。这个体育场在时法租界越界筑路区域，大约是今天交通大学医学院(原震旦大学)以东的一片，是当年上海最好的体育场馆之一，举办了诸如前述“江南大学体协”第一届运动会等一系列重大运动会，是上海体育竞赛的中心体育场。但这块地属于洛氏基金会，到1933年5月，洛氏基金会发出迁移通知，中华棒球场就此成为历史。洛氏基金会一开始打算将此地块捐给一位医学教育家开办现代医学中心；建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但最终因过于毗邻法国天主教的好德医院与震旦医学院，被法租界当局否定。那所医学院最终选择去枫林桥南，那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说服洛氏基金会捐地的人就是上医的创院院长顾福庆。

“邀请赛”下南洋

李惠堂为复旦足球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训练比赛与夺取锦标，因为李的执教，使得复旦在整个南洋地区也扩大影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功勛校长李登辉先生(1872—1947)本人就是印尼华侨，南洋地区的师资、生源与资金支持成为当时复旦办学的重要招牌。“下南洋”为学校募集经费，也是包括复旦足球队在内的复旦



▲ 中国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李惠堂曾兼任复旦足球队教练

体育团体需承担的任务。1929年春，复旦足球队第一次下南洋募款，1929年3月21日《申报》登载《复旦足球队首途南征》的报道：“复旦大学足球队去年曾得上海中华足球会锦标，现为该校前南洋作募捐之宣传，于本月二十日，乘约翰生总统号前赴新加坡。”一周后，船才到马尼拉，之后还先打过一场友谊赛。同年4月11日的报道《复旦足球队南征胜利之第一声》：“现得该队来电，谓于二十六日晨抵小吕宋，备受侨胞之欢迎。并在马拿呷(Malacca)与该地‘中华

足球队’作友谊比赛，以五对二得胜。现赴新加坡等处比赛。”“小吕宋”即菲律宾马尼拉，“马拿呷”为马来西亚马六甲，两地相隔颇远，或为航路先经过马尼拉，再至马六甲。这场与“中华足球队”的友谊赛可能是计划外的，因他们此行主要目的是新加坡。在新加坡，复旦队首战新加坡华侨队，地点在马赛展览会旧址足球场，两队打了个0:0，几天后与英兵队打了一场1:4告负。

新加坡本地的《南洋商报》《海峡时报》等中英文报纸对复旦足球队来访问报道。这一次复旦大学的筹款活动在由新加坡本地的接待人是新加坡二十世纪初叶的福建巨贾胡文虎(1882—1954)，他也是著名的虎标万金油的老板。民国时期，南洋华侨对复旦给予了很多支持，其间复旦与南洋的互动可谓非常密切。复旦初创时，最重要的办学支持来自准军事及其周边的改革派，因马相伯家族曾与准军事及其领袖李鸿章关系密切，复旦创办吴淞、迁校无锡及复校徐家汇李公祠，无不得到准军事的关照。而早期校内师生也多晚清新式读书人的色彩，其中闽籍精英改良派如严复、陈三立等群体成为复旦的中坚力量。1913年李登辉执掌复旦后，迅速吸纳闽籍及南洋力量加入复旦，王宠惠(虎门)一度任教务长，孙中山(香山)、唐绍仪(香山)任校董，为复旦筹措不少南洋资源。李校长更是在1918年亲赴南洋募集新建校园的善款。其中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南海)与中南银行黄奕住(同安)都为江湾的复旦新校区捐资建楼。而1924年起，李校长多次来到南洋募捐之宣传，整个南洋世界全力支持复旦的近代高等院校，除了著名的厦门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外，当时的复旦大同同样在列。(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